

# “墨子故城”遗址发现经过与探究

张新河 张九顺

2004年7月6日，我同张九顺同志一起从河南鲁山县城出发，南行考察墨子“止楚攻宋”线路。先后考察了所谓墨子“止楚攻宋”时的楚郢都——湖北宜城市、荆门市（江陵）。寻访了两地史志办公室相关人员，查阅了有关史志文献资料，竟没有发现“墨子与楚郢都”有关的可靠证据。7月8日中午的归途中，我们顺便考察了河南邓州市构林镇高洼村“墨城故址”遗址。

## 一、“墨城故址”考察经过

地方史志是探究地方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库，它比较详尽地真实记载着一个地方不同阶段的发展历史。我们研究墨子遗迹遗事，也从查询地方史志入手。

根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邓州市志》记载：“墨城故址，战国古城遗址。位于市区南20公里的构林镇高洼村。城址呈长方形，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现存城基遗迹高1米。遗址内有战国时期水井两眼和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重修墨城碑记。属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又称：“约公元前21世纪，夏帝仲康封其子于邓，始建邓国。公元前16世纪，邓为商朝诸侯国之一。周朝初期邓为曼姓侯国。公元前678年楚灭邓，邓为楚地。”

出于对墨子研究的敏感，《邓州市志》记载的“墨城故址”引起我们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因为邓州距墨子集中活动的鲁阳地区太近，仅百余公里。我们怀疑“墨城故址”有可能与墨子有关，但也没

有抱很大希望。因为，我国有好几处“墨城村”，考察结果，都是“制墨、卖墨”之所，与墨子无涉，我们都是扫兴而归。决定顺便现场考察邓州“墨城故址”。

我们从荆门市考察归来，到了邓州构林镇，巧遇高洼村青年村民李逢先和古村村民李立新。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们热情地给我们当向导，陪我们一同考察位于高洼村附近的“墨城故址”。

“墨城故址”在高洼村西南前李洼村正南的一片高地上。高地上，农、林间作，成排成行的杨树十分葱密茂，树下行间，玉米苗生长旺盛，而其土地并非黑色，黄土高地上几间房子里住着承包土地的农民。

“墨城故址”上，有灌溉渠系由西向东通过。我们围着“墨城故址”考察了一圈，发现“墨城故址”东南角和东北角，有隐约可见的护城河壕沟遗迹。李逢先说：“我今年30岁，知道事不多，听说挖这“三斗渠”时，有人捡到古玩艺儿，不知道是啥，也不知弄哪里去了。”于是，李逢先和李新立又带我们到人群集聚的地方——后李洼村东头。

盛夏酷暑的乡村中午，多个村民正围在树阴下乘凉、聊天。我们趁此访问村民。40多岁的村民李贵龙说：“听说墨城是因为墨子在这里住过。”（“墨城故址”当地群众简称“墨城”。）我们问：“听谁说？”他说：“都这样说，大家都知道。”几个村民一同说：“您去见见高成甲老师，他是退休教师，他能说清。”村民李逢先帮我们找到高洼村高成甲先生。高先生当年（2004年）77岁，是位退休教师，解放前肄业于河南省第六高中。他说：“‘墨城故址’，传说在2300年前的

战国时期，墨子在这里住过。而且是墨子在这里建的城。墨城分里城和外城，墨子在城中城住。古代高洼村是供给墨子城内人员吃菜的。我小时候，高洼村南还有24眼古井，每口井管浇两绞地。（相当于三亩，两绞地即是两耙宽，一耙地为7市尺宽，两耙宽为14市尺）现在还有两眼被填住井口的古井遗址。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修“三斗渠”时经过墨城，在地下挖出了砖、瓦等器物。过去墨城一带村庄为一个里，墨城本应叫‘墨里’，发音为‘没里’，即‘没有里’，听着不雅，就改称‘黑土里’。因为‘墨’字是由‘黑’和‘土’两字组成。称构林镇为黑土里保。再后来，就改为高洼村。在高洼村西头，挖白灰池时，发现有一面直径七八厘米大的铜护心镜；还发现有两个铜箭头，一长一短，长的已毁，短的有四五厘米长，现在还保存着；还出土有农民犁地用的大铁铧，比现在用的铧大一倍多；后李洼村李老廷犁地时犁出一个8斤左右的长方形陶瓦，已损。还有好多出土遗物。”实地考察和高成甲先生的介绍使我们非常震惊：原来这里真是古代墨子建筑和居住过的“墨子故城”！《邓州市志》记载和群众口碑完全一致。如果出土文物鉴定和文物再发掘能够证实是战国时期物品无误，这里定是“墨子故城”无疑。

墨子为什么要建城？城为什么要建在楚国境内的构林高洼村？是战国什么时间建的？一连串疑问，引起我们对“墨城故址”的深入探究。

## 二、墨子“城守”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为了叙述方便，“墨城故址”以下简称“墨城”。高洼村“墨城”

是墨子“城守”思想的产物。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的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初期的诸侯称霸之际。作为庶民士人，墨子深深地体会到，诸侯间频繁的吞并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颠沛流离地战争痛苦。人民期待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墨子从劳动人民利益出发，采用“文攻武备”的战略对策，一方面用“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兼相爱、交相利”，“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思想理念，制止战争、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争取和平，试图用说理“谈辩”的办法，说服诸侯休战。而另一方面，墨子则做好抵御战争的“城守”防备。

“止楚攻宋”、“止齐攻鲁”、“止鲁阳文君攻郑”的实践说明，他虽然能够一时制止战争发生，但并不能永久地完全地制止战争。因此，墨子积极防御的“城守”思想应运而生。《墨子·七患》称：“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由此可知，墨子把筑城不仅当做是一个国家的“三具”之一，而且，明确指出筑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自守”。可见，墨子的“城守”思想，是抵御诸侯争战的重要举措，是他“文攻武备”对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在《墨子》一书中，也有明确反映。《墨子》一书，前半部分重在说理“谈辩”；后半部分，讲的却是“城守”攻防战术，这说明墨子“文攻武备”战略对策，是逐步由“文攻”，进而发展到“武备”的，而且诸侯间无休止的争战，是墨子“城守”思想产生的重要根源。他建造“墨城”，研究“城守”战术，造就治国、平天下人才，抵御诸侯间攻罚争战的目的，是为百姓赢得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诸侯称霸的社会现实，使墨子“文攻武备”的战略思想，不得不由初期

的“谈辩”理论，逐步上升，进而发展到“城守”实践。所以，我们说，墨子“城守”思想，是我国战国时期诸侯间相互攻伐的必然产物。

### 三、鲁阳文君与墨子的亲密关系是墨城在楚境建造的重要条件

为探求墨城故址渊源，我们有必要首先理清鲁阳文君和墨子的关系。

周赧王四年，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78年），邓和鲁阳同年属楚，邓邑和鲁阳邑均为楚国管辖。要探究鲁阳文君和墨子的关系，必须弄清鲁阳文君在楚国的地位及鲁阳文君与楚惠王的关系。

#### （一）鲁阳文君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及其与楚惠王的亲属关系。

《史记·楚世家》载：“子西平王之庶弟。”子西和子期同为兄弟。楚平王卒，其原娶秦女生熊珍，史称昭王；楚昭王妾越女生子章，后为惠王。子西为令尹、子期为司马。楚昭王卒后，二人共佐楚惠王。白公胜作乱，杀子西、子期，劫惠王。月余，叶公救楚，惠王复位。是时，为楚惠王十年（公元前479年）。因子西、子期死，叶公身兼楚国令尹、司马二职。楚国稳定后，子西子公孙宁嗣令尹；子期子公孙宽嗣司马，而叶公于叶退休养老。事见《左传》、《国语》、《史记》记载。清人高士奇《左传姓名同异考》云：“公孙宽亦曰鲁阳文子，亦曰鲁阳公。”以《史记·楚世家》和高士奇所云，子期子公孙宽，亦曰鲁阳文子，先为鲁阳公，继为楚司马，后为鲁阳文君，由此推知楚惠王应尊鲁阳文君为叔父，二人当为叔侄关系。

另说是，据《左传·哀公四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1年）载：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馯、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缙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袭梁与霍”。梁地与霍地，同是鲁阳北紧邻的今汝州市境。此战后，梁、霍又属楚地。据《国语·楚语下》载：“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曰：‘梁险而在境，惧子孙之有贰者也。夫事君无憾，憾则惧逼，逼则惧贰。夫盈而不逼，憾而不贰者，臣能自寿，不知其他。纵臣而得全其首领而没，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孙，施及楚国，敢不从子。’与之鲁阳”。这是《国语》关于楚惠王以梁地给鲁阳文子管辖，鲁阳文子辞，后与之鲁阳的记述。高诱注《淮南子·览冥》的“鲁阳公”云：“鲁阳，楚之县公也，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子，《国语》所谓鲁阳文子。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故曰鲁阳公。今南阳鲁阳是也”。韦昭注：“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梁，楚北境也。文子，平王之孙、司马子期子鲁阳公也”。据考，《国语·楚语下》所载“鲁阳文子辞惠王所与梁”事，是楚惠王在公元前477年，首开楚国封君之先河，封析君子国（子西子公孙宁）后，次年（公元前476年），再封鲁阳公（子期子公孙宽）为鲁阳文君。由此可知，楚惠王对鲁阳公是很看重的。按高诱与韦昭注推算，楚惠王与鲁阳公（后封为鲁阳文君）应是同辈兄弟亲属关系。

上述叔侄关系也好，此说兄弟关系也罢，总之，楚惠王和鲁阳文君的亲属关系是肯定的。楚惠王对鲁阳文君“施及楚国，敢不从子”的十分敬重态度亦是历史事实。由此可见，鲁阳文君在楚国的地位举

足轻重。不仅如此，即使在下述《渚宫旧事》引文中，也可见到鲁阳文君同楚惠王的关系甚密和鲁阳文君在楚国的特殊地位。

## （二）鲁阳文君与墨子的密切关系。

鲁阳文君与墨子的关系非常密切。首先见证于《墨子》一书的“鲁问”篇和“耕柱”篇。墨子和鲁阳文君在“鲁问”篇中有五段对话，在“耕柱”篇中有两段。从这七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墨子所居与鲁阳文君很近，而且交往密切。“鲁问”云：“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闻而止之”，不仅说明“相距较近”，而且有“立即劝导”的密切交往关系。其次见证于《渚宫旧事》：“鲁阳文君言于王（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君王不见又不为礼，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书社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在楚惠王使穆贺以老辞时，鲁阳文君及时劝导楚王，并说明墨子是楚国北方的贤圣人，君王不见不合礼仪，莫要这样失去贤士；楚惠王马上采纳，立即委派鲁阳文君追赶墨子，又“以书社五（百）里封之”，墨子却不受而去。由此看，鲁阳文君对墨子的态度是非常积极和十分友好的：一是主动劝导惠王；二是亲自追赶墨子；三是转达惠王之意，“以书社五（百）里封之”。这不仅说明，鲁阳文君对贤圣人非常尊重，更重要的是体现了鲁阳文君对一个老朋友、老相识的深情厚爱。

## （三）墨子城守思想同鲁阳文君在楚国北鄙防御战略紧相吻合。

楚惠王执政五十年（公元前439年）时，惠王年势已高。鲁阳文君也当在60岁以上。此时，楚国政治上已由鼎盛转向稳定时期，军事上也由进攻转向防御。楚国的战略防御形势同墨子反对非正

义战争、积极防御的“城守”思想，两者完全契合。在双方主张一致、意向相同时，交往也自然密切。

鲁阳文君同墨子的一致主张和密切关系，为墨子在楚境建造“墨城”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墨城故址”的位置看，正是建在鲁阳文君从鲁阳出发到楚郢都（郢都）的路途上。可见，“墨城”在楚国邓邑构林的选址与建造，与墨子和鲁阳文君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墨城”建造的事实同实现墨子“城守”主张与鲁阳文君在楚北鄙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又成为友谊的纽带，使双方关系更为密切。

#### 四、“墨城”与“止楚攻宋”的历史契合

墨子和鲁阳文君一致的城守主张和防御思想及密切的朋友关系，使“墨城”由理想变为现实，最终在紧邻鲁阳的邓邑建成。它为墨子研究城守战术、培养军事骨干，造就治国、平天下人才奠定了基础。于是，著名的墨子“止楚攻宋”和“墨子故城”出现了历史的契合。

墨城所处地理位置正在墨子“止楚攻宋”，从鲁阳出发至楚郢都（郢都）（实为军事要地钟祥）的途中。马世之先生《中原楚文化研究》中称：“古代楚与中原之间的交通线路甚多，其中最著名的为‘三鸦路’和‘夏路’。三鸦路为从南阳盆地，循白河北上折出鸦河，沿鸦河河谷，逾伏牛山分水岭（楚长城鲁阳关处），下灊河河谷（已入鲁阳境）进入豫西伊、洛、汝流域，可达洛邑。‘夏路’起自南阳盆地，出方城隘——缙关，过叶（今河南叶县西南）经郑（今河南新郑）、棗林（今郑州市东南）、管（今郑州市）北上至板城渚口……”墨子

从鲁阳出发，经南阳盆地，至湖北宜城，折向东南去郢都，再至军事要地钟祥，必先走“三鸦路”。“三鸦路”是通往南阳盆地以南的惟一一条捷径，别无它途。墨子当不会走“夏路”，从鲁阳出发，向东走一百多里后至叶，再向南绕一个大圈，再去南阳盆地。墨子“止楚攻宋”当从鲁阳出发，走“三鸦路”，过“鲁阳关”。“鲁阳关”在“三鸦路”上，为楚长城一重隘。历史上，汉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杀，出南阳，走南召，临伏牛山，无路可通，得三鸦引路遂得以通过。西晋中书侍郎张协字景阳存世《张景阳集》，对“鲁阳关”的描绘是：“朝登鲁阳关，狭路峭且深。流涧万余丈，围木树千寻。咆虎响穷山，鸣鹤聒空林”……鲁阳关险要可知。而墨子自鲁阳出发至郢都，必经鲁阳关。上有树枝“摩顶”，下有荆棘挂踵，中听虎啸群山。当“裂裳裹足”，以防蛇虫咬伤。没有“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的精神，鲁阳关是难以通过的。只有走过鲁阳关的人，对墨子“摩顶放踵”的精神，才有真切地感受！而“墨城”，也正在墨子“止楚攻宋”路途上——楚国邓邑的“南阳盆地”。这是历史事件的线路契合。“墨子献书惠王”及“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极有可能，都是由“墨城”出发，南趋而至的。我国古代修筑道路，因机械和技术条件限制，多是沿古线路走向，或路基拓宽或加固路基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建设的焦枝（河南焦作至湖北枝城）铁路，也是沿着古代线路走向修筑的。如洛阳—汝州—宝丰—鲁山（鲁阳）—南阳—襄樊段均是如此。此线路所沿走向就是古“三鸦路”的线路走向。焦枝线经鲁山，向南过鲁阳关（设有交界车站），至南阳达邓州，穿构林（设有构林

车站), 铁路线从紧邻“墨城故址”的高洼村通过。这是墨子“止楚攻宋”及“墨城故址”路线与现代焦枝铁路线路的历史契合。铁路线路如此, 经过这段的公路交通线路更是这样, 故无须赘述。

墨子“止楚攻宋”在公元前440年。墨子献书惠王在公元前439年。“墨子故城”当在墨子“止楚攻宋”时已经存在。《墨子·公输》载：“……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圉有余。”墨子终以城守战术战胜公输盘的攻城战术。又称：“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由此可知，此时，墨子已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而且已有研制出的“守御之器”。“墨城”，当已存在。

墨子献书惠王，在墨子“止楚攻宋”次年，似有弟子公尚过携书随同。《渚宫旧事·卷二》载：“墨辞曰：‘翟闻贤人进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今书未用，请遂行矣’。将辞王而归。”可见，《墨子》一书竹简，于公元前439年已经成册。

《墨子》一书的成果问世，应与“墨子故城”有关。它为探究“墨城故址”与墨子“止楚攻宋”的历史契合，提供了文献佐证。

## 五、“墨城故址”遗迹遗物的启示

“墨城故址”周围村民发现的遗迹遗物和《墨子》书中城守部分的“备穴”篇，内容极为相似。2004年7月8日中午，笔者在邓州市构林镇高洼村寻访高成甲先生时，高先生讲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 （一）墨城分里城和外城，墨子在城中城住

袁行霈、严文明编著的《中华文明史》称：“宫城与郭城分置的作法，早在商代就出现了，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比较普遍地分筑宫城和郭城，则是从东周时期开始的。东周列国都城虽各式各样，但均是由宫城和郭城组成”。战国时期，各国已经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墨子·非攻（中）》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已普遍出现。《管子·度地》云：“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吴越春秋》曰：“筑城以围君，造郭以守民”。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城”和“郭”的用途是有所区别的。战国时期的“墨城故址”，若设置为模仿攻防双方的战略体系，当不能例外。自然有“里城”（内城）和“外城”（郭城）之分。墨子居“城中城”（内城）也是必然。由此可知，《邓州市志》记“墨城故址，战国古城遗址”及高成甲先生所言，正和战国时期的“城”“郭”的分置情况完全吻合。

### （二）“墨城故址”东侧，尚存古井24眼

高成甲先生讲，1935年左右，在“墨城故址”东侧，尚存古井24眼。井与井间隔“两绞地”，每眼井的出水量，能够浇灌三亩菜地。《墨子·备穴》称：“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意思是，要在城内挖井，每隔五步挖一井，要靠近城墙基。按每步3市尺计，五步为15市尺，这和“两绞地”宽14市尺相近。这24眼井，有可能是在城内，靠城墙基处，以守城防备敌人入侵时的“教练”井。当然，也不能排除，是当时城内的墨家弟子们，作为饮用水源，或防火、或用于农耕灌溉和种菜的可能。如是说，24眼井用于浇灌种植72亩菜地的话，那

么，生活在“墨城故址”内的墨家弟子，至少要在百人以上。墨城这样的规模和古文献“百八十三人”、“三百弟子”的记载，完全吻合。

### （三）重八斤左右的长方形陶瓦

《墨子·备穴》称：“令陶者为月明（瓦窠），长二尺五寸六围，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偃一，覆一。”意思是，命陶器匠烧制瓦管，每根长2.5市尺，大6围，从中剖开为两块，合起来安装在隧道里，两块上下合成圆柱。另外，“备穴”篇还讲道，在每条隧道口设两个灶，灶上都要盖上瓦顶。村民见到的，可能是瓦管剖开后，其中的一块瓦，或是用于盖在灶上的瓦。瓦在西周时已经出现，据1995年西北大学出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镐京西周宫室》称：“在洛水村北的一座水井中发现了大量瓦片和白灰粉刷的墙皮。完整的板瓦长45厘米，宽为30厘米，是很有气派的”。由此可见，这样重八斤左右的长方形大陶瓦，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墨城故址”，和历史是吻合的。

### （四）发现有长、短铜箭头。

战国时期，作为冷兵器的弓弩已普遍使用。《墨子·备穴》称：“为短矛，短弩（芒）矢、财自足”其意是，短矛、短戟、短弓、短箭也不必多造，够用就行了。既有短箭之说，当有长箭之谓。既有长、短箭，必有长、短箭头。长、短箭各有防御之用途。这些器具出现在战国时期“墨城故址”的“军事训练基地”，当是必然。

### （五）挖出一座古墓

据高成甲先生讲，1972年冬，高洼村村民高有富，在墨城东南最高处，挖出一个4米间方、3米高的大墓。墓南面、北面各有一个门。

中间人身已化。内有约15至20厘米高的鸡、鸭、鹅、羊、猪、牛陶制品，20—30件，已损。这些陶制禽畜的陪葬，可见证死者的时代和身份。葬者，是否为墨城中分管农耕的墨家弟子，或为墨家巨子禽滑釐之墓，也未可知。若此，当时墨城的农耕已具相当规模。

#### （六）发现有“铁大犁铧”

袁行霈、严文明编著的《中华文明史》称：“根据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冶铁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500——前2300年的西亚一带，而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人工铁器则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大墓，而时代为两周之际（公元前八世纪前半叶）。”“年代稍晚一些，即属于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的人工铁器还发现于南方的楚国，东南的吴越国等地，……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玉柄铁匕首……”“从以上所列举的中国内地人工铁器的出土情况看，时代从两周之际至春秋战国之际并未中断，而降至战国时期则发现的地点、数量急剧增加，至战国中期已进入广泛使用阶段。由此可知，中国古代至迟在两周之际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铁器较早的发现多集中在广义的中原偏西地区，即河南西部、陕西关中、山西南部、甘肃东部这一大片相连的区域，这一现象是值得深思的。”另据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辉县发掘报告》称：“据考古发现，战国中晚期，铁农具使用已很普遍。例如：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一次出土铁器160多件，其中铁农具就有58件。……还应特别提出的是，铁犁铧已经出现，所见多是一种“v”字型的铁铧冠”。

很显然，上述所称中国铁器较早发现的时代、区域以及铁犁铧的“v”字形状，与战国前期邓州“墨城故址”出土的“铁大犁铧”相比较，在时代、区域和“v”字形状上，是完全吻合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综观上述，从“墨城故址”村民发现的遗迹遗物及群众口碑，同文献记载相吻合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河南省南阳市邓州构林镇的“墨城故址”，当是战国时“墨子故城”无疑。这座由墨子亲自建立的故城，既是墨家弟子的大本营，又是墨子为研究城守战术，造就治国、平天下人才，而创办的一所古代“军校”。

这所古代“军校”非同寻常，他的创办者既不同与五谷不分，种菜不如老圃而施教的儒家；也不同与鬼谷子，入云梦山，潜心修道治学，教化孙臆、庞涓、张仪、苏秦的“兵家”与“纵横家”；他所教化的弟子，是因“道义”而聚，因“道义”而学，因“道义”而为。一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文武兼备、侠肝义胆，敢为“道义”而“赴火蹈刃，死不还踵”的墨家弟子。《墨子·公输》“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和《吕氏春秋·离俗览》“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记载的两次历史事件，就是对这座古代“军校”“墨家精神”的客观而真实地诠释！

墨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实践家，是庶民士人，是工匠出身的劳动者。墨子故城的生活与教育方式，自当不同于儒家和兵家。他可能因人而宜，依照“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的原则，采用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士”、“耕”、“工”、“武”相

、 “备梯”、  
“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的“七备”中可知，墨子用于实践的“教学器具”，都得由墨家弟子自己动手制作，在学中教，在教中学。墨子本人又是工匠，技能又在公输盘之上。按照“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悬）”等“墨守成规”的法度准则，教弟子工技和做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及城守防御战术，当不是难题。“墨城故址”周围的大面积土地，似是用于军事训练、农耕、工技的重要场所。

试想，这种以“道义”凝聚起来的墨家弟子，又是施以特殊教育方式教化出来的人才，一定以行“道义”为先，以和合、谐调为重。他们既是懂得哲理的庶民士人，又是农工劳动者，还是体质强健的勇猛战斗者。这样一个文攻武备、智勇双全的团体，必定是一支义薄云天、摧不垮、打不烂的坚强队伍。

#### 【注释】

1，“墨子故城”的发现，是必然也是偶然。说必然，是因为墨子经常活动在鲁阳一带的楚国地域，必然留下一些遗迹、遗物；而发现这些遗迹遗物的人，却得力于《邓州市志》记载和赵震恒先生的“点拨”：1997年秋，“全国墨学研讨会暨河南省墨子学会成立大会”在河南省石人山风景名胜区举办之后，笔者在郑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有幸见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南省墨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萧鲁阳先生。萧先生说，你接个电话，对方是河南省教委的赵震恒先生。赵先生在电话中说：“……你们在石人山开会的前三天，墨子的法身已经到了！在石人山南部，还有墨子的遗物存在！”根据赵先生的“点拨”及《邓州市志》关于“墨城故址”的记载，（从河南省地图看，邓州市构林镇高洼村正在石人山风景区南部）我们决定南行考察，所以，“墨子故城”的发现是必然的！说偶然，是我们第一次考察墨子“止楚攻宋”“未获确证”，顺便考察“墨城故址”，不意中却发现“墨子故城”，取得这一收获！是偶然，是必然？反正，上述赵震恒先生“点拨”“在石人山南部，还有墨子的遗物存在”——我们的确在石人山南部的邓州市构林镇高洼村，发现“墨子故城”遗址，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2，本文主要内容参考2011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新河 张九顺 著《墨家鲁阳悬疑案》第167至181页《楚“墨城故址”探源》一文。

[作者介绍]

张新河，鲁山县辛集乡高村人，1942年9月生。1965年参加工作，曾在鲁山缫丝厂、靳家门煤矿、县城建局、县政府办公室、石人山管理处工作过，历任县城建局局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石人山管理处处长、主任等职，2002年9月退休。